

高等教育与大学建设

# 清代盛京教育论纲

周浩波<sup>1</sup> 高扬<sup>2</sup>

(1.辽宁大学党委,辽宁沈阳110036; 2.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摘要:**清代盛京教育的基本模式是奉天府所辖汉人教育,采取全国一致的模式。而宗学、觉罗学、八旗学则与京师的宗学、觉罗学、八旗学相近。盛京科举不盛,考中者亦少,落后直省甚多。新学兴起之后,奉天曾有过一个突飞猛进时期,但很快又再次衰落,其轨迹有值得深思之处。盛京教育在东北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盛京区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人才资源储备。

**关键词:**清代;盛京区域;教育体制

**中图分类号:**G529/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9)04-0162-10

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移居镇守辽东,特别是建立后金政权后,尤为注重本民族即满族的教育问题。努尔哈赤曾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提高女真人教育水准,当然多是应急之举,但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开启了清代300年教育体制的总格局。随着明清战争局势的发展,清军终挥师入关,政权以及教育等统治主体均随之定鼎北京。曾经的都城盛京作为龙兴之地,则建立了以军事管理为主的将军辖区体制。清顺治元年(1644年)设盛京总管,三年改盛京昂邦章京,辖东北全境。顺治十年,析吉林以北地区置宁古塔昂邦章京管辖。盛京昂邦章京在康熙元年(1662年)改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四年改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乾隆十二年(1747年)改镇守盛京等处将军,自此统治机构基本稳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设奉天省,大体即今辽宁省行政区划。本文所述之“盛京”,主要指分置宁古塔昂邦章京后,以今沈阳为中心的盛京将军辖区(奉天省)。总的看来,盛京教育虽然也取得长足进展,有了很大改观,不过相对来说水平还是较为低下,与全国特别是江南地区比较而言,仍然呈现落后状态。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sup>①</sup>但是从整体来看,关于盛京教育的研究仍显薄弱,既需要进一步加强细节考证,也需要推

**收稿日期:**2018-11-08

**作者简介:**周浩波,男,江苏大丰人,辽宁大学党委书记,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学、中国教育史。

高扬,女,辽宁开原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

<sup>①</sup> 关于清朝盛京教育研究的著述颇丰。著作如:王鸿宾等主编:《东北教育通史》(第8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李喜平主编:《辽宁教育史》,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张希清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朱诚如主编:《辽宁通史》第2卷,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陶增骈主编:《东北民族教育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贵忠:《东北职业教育史:从远古到民国》,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佳生主编:《满族文化史》(第4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论文如:张杰:《清代东北边疆地区的科举进士家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张晓明:《论清代奉天私塾教育》,《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张晓明:《论清代盛京地区传统教育》,《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范立君:《清代盛京地区的满语文教育》,《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尤世彪:《清前期盛京八旗官学略论》,《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6年第12期;高荣:《清代早期东北地区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6期。此外,还有一批硕博论文也讨论了流入建学、八旗官学、满洲进士、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等等相关问题,数量庞大,内容上以描述具体事实为主,兹不赘述。日本学者所撰,有山田丰:《满洲教育史考》,《南满教育》1932年;满铁初等教育研究会编:《满洲教育史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方学务课,1933年;嶋田道弥:《满洲教育史》,大连文教社1935年。以上三著,笔者未见。

进宏观思考。本文试述盛京教育总体情况,以为建立框架并希冀深入研讨之起步。

## 一、盛京教育体系的基本格局

清天聪五年(1631年),清太宗皇太极攻打大凌河城后,即颁布了一个读书令:“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sup>①</sup>是为盛京教育体系建设的发端。清入关以后,随着政权的统治及教育主体移往京师,盛京作为发祥之地,只有宗室教育最为重要,其他远远落后于内地各省。大体来说,盛京教育的基本体系,以科举为导向,以宗学、官学、儒学、社学、义学、书院为基本框架,取消科举后则建立了新式学校体制。除了皇族与宗室、八旗教育之外,余与全国相同。近代学校体系建立以前,教育的基本目标是为清政府的集权统治来培养官僚后备队伍(封建统治人才),而非提高民众知识水准。为此,本文参考《盛京通志》《奉天通志》等书籍,略加简述<sup>[1]</sup>。

乾隆元年(1736年),在盛京设立了盛京宗室觉罗官学。<sup>②</sup>收20岁以下,10岁以上的宗室、觉罗子弟入学,分别学习满文和汉文,兼习骑射。宗学不限名额,选拔年高有德宗室长辈为总管,另设副管,教师从笔帖式和奉天府学当中选拔。每年考核,且由将军府尹会同宗学总管共同主管考试。如学业优良,五年期满,可授官。在学期间,一切公费、银米、纸笔、冰炭等均如京学待遇。

宗学、觉罗学之外,八旗官学也选拔满洲、蒙古、汉军子弟入学。康熙三十年,因“盛京系发祥重地,教育人才,宜与京师一体”,<sup>③</sup>设立盛京八旗官学,选拔旗籍的幼童每旗10名。分别学习满文和汉文,也同时学习马步弓箭(骑射)。由盛京礼部主管,满学内设有满学助教1名,汉学内设有通满汉文的助教1名。教师待遇优厚,且由盛京户部支拨。同时,八旗还设有义学。八旗子弟,十岁以上,由佐领推荐1人。满洲幼童学满书满语,蒙古幼童学满洲蒙古书、满洲蒙古语,汉军幼童学满书满语,同时学习马步弓箭(骑射)。到雍正十年(1732年),改设奉天府汉军义学。共有汉军义学4所,每学30名,共计120名。

清军入关后,随军入关者仍然寄籍辽东。所以辽东十五学,寄设于直隶永平府,设三教官。顺治五年,取消十五学,改设辽学,学额80名,有教官1人。顺治十一年,设立辽阳府儒学。康熙四年,增设盛京各府州县儒学。奉天府比照顺天府,为京府大学,生员7名。辽阳、宁远、海城为中学,取生员5名。盖平、铁岭、广宁为小学,取生员2名。锦州府学,取生员4名。康熙五年,寄学取消。康熙四十年,奉天各学增加入学数额,以后又陆续有所增加。到乾隆三十六年,略有削减。乾隆四十八年,高宗东巡,又再次增加名额。统计儒学有奉天府儒学、承德县儒学、辽阳州儒学、海城县儒学、盖平县儒学、开原县儒学、铁岭县儒学、复州儒学、宁海县儒学、锦州府儒学、锦县儒学、宁远州儒学、广宁县儒学、义州儒学等14所。

顺治九年,令各省设置社学。每乡一所,选择一名社师,免徭役。雍正元年,定各州于大乡、大镇设置社学,周边子弟年龄在十二以上,二十以下可以入学。盛京亦照此办理,设有辽阳州义学、盖平县义学、开原县义学、锦州义学、宁远州义学、广宁县义学、铁岭育英义塾等。

书院更为高级,原本属私人办学性质,但是多接受了官府赠款或者地方捐献,具有半官方的性质。盛京设有沈阳书院、萃升书院、襄平书院、海州书院、他山书院、银冈书院、凌川书院、启凤书院、柳城书院、南金书院、启运书院、开文书院、辽西书院、龙冈书院、辰州书院、秀水书院、辅翼书院、莲沼书院等。其中最早的是流人郝浴所建银冈书院,较为著名的则是沈阳书院及其取代者萃升书院。

散落民间各个角落的则是私塾,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郝浴在铁岭授学。到清代中期,盛京、辽阳、锦州等地私学发达起来,各地均有设帐授徒者。有学者(张晓明)刊文对盛京的私塾教育体系进行了分析,讨

① 《清实录·太宗实录》卷18,天聪八年四月辛巳。

②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9,第331页。

③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150,第667页。

论了私塾的教育内容,认为盛京私塾扩大了受教育群体的数量,提高了社会群体的文化素质[2]。

## 二、盛京教育的管理体系

清代教育管理为独立系统,与督抚并列。按清制,地方上主管教育的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命。一般来说,内地主管一省学校政令长官,称提督某省学政,也叫督学,地位略低于巡抚,为钦差之官,地位显赫,多在进士出身的翰林、侍郎等官员中选拔。一般情况下,学臣岁、科两试周全,由礼部加以考核,再由都察院审核,优异者,可升京堂。学道两考完毕,要提前告知礼部,礼部与吏部会商,铨补新官。康熙元年,学道任满考核,由礼部转吏部管理。不过,盛京作为发祥之地,长期奉行的是封禁政策,早期也无所谓学校事务,很久也没有专设的学政官员。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专设奉天府尹,驻盛京。因盛京陪都地位特殊,奉天府尹为正三品,比一般行省知府高出三级,与顺天府地位相同。康熙三年(1664年)设府丞一员,并督理学政,且同时管理吉林、黑龙江学政事宜。雍正以前,先后任奉天府丞的有白尚登、于可托、苏铨、田种玉、荣国祚、姜希辙、张尚礼、边声廷、张鼎彝、杨素蕴、李元振、陈紫芝、李锦、张云翻、金玺、徐廷玺、金泰来、任弘嘉、屠粹忠、樊咸脩、李先复、陈嘉绩、马希爵、顾沂、戴璠、朱廷铤、吴一蜚、汤右曾、张德桂、孟世泰、吕履恒、黄叔琳、张大有、陆经远、文志琼、任弈鏊、杨汝谷、唐执玉、乔云名、程光珠、须洲、柯乔年、吕文樱、王河等44人。雍正时,给予学政养廉银。各地多寡不同,而奉天府由府丞兼管学政,每年原定养廉银四百两。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对各省养廉银加以调整,河南、广东、浙江减三千余两,增江西、广西、贵州、湖北后,有剩余一百六十余两,决定将此一百六十余两赏给奉天府丞,以资办公。<sup>①</sup>

一般情况下,府、州、县学,设置教官管理。府学有教授和训导各1人,州学有学政、训导各1人,县学有教谕、训导各1人。前者负责考察学生,评定等级。后者管理学校事务。奉天府并有儒学教授一员,顺治十年先设于辽阳府,十四年改奉天府学教授;顺治十年设训导一员,康熙三年裁撤训导,康熙十六年复设,康熙三十九年再次裁撤训导。康熙二十年,设有辽阳州学政一员。海城县、盖平县、铁岭县,各有训导一员;永吉州设学政一员;复州有学政一员,锦州府有儒学教授一员,锦县有教谕一员,宁远州、广宁县、义州各有学政一员。先后任奉天府教授的有魏之璠、杨复、张奇抱、高恒懋、刘宾廷、马璐、乔木、左印喆、鲁城、李修和、胡文灿、陈诗、赵瓚、高阳等14人,任训导的有于国维、曹重辉、王在镐、刘绳祖等人,而其他州府县任学政、教谕者甚多,不再具列。

同时,盛京礼部也分管少部分学政事务。礼部顺治元年迁京,礼部事宜由盛京昂邦将军管理。顺治十五年,重设盛京礼部,设侍郎一员[3]。历年又增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委署主事、读祝官、鸣赞官、司牲官、管千丁六品官、助教、笔帖式、医学正科、外郎、养息牧政总管、副总管、僧策、道策等职务。雍正以前,先后任礼部侍郎的有胡米达、哈尔松噶、锡兰泰、珠山、山疋、艾素、哈三、书尔德、巴已那、关色、申珠浑、德福等人。

学校均有学规,多数执行甚严。想参加科举选拔,必须进入各级学校才能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盛京地方的生员数量、课程规划,基本执行朝廷规定。学官定期对学生进行考试,一般是先拜文庙,然后于明伦堂相见,学生依次揖见。生员抽签选择讲书,一般要讲《大清律》,讲毕,等待教官考核。讲习训饬,同时解释学宫卧碑条文,每月有月课,每季有季考。在四书之外,还需要学习策论,诸生需要环立听讲。这些规则,均与内地相同。

<sup>①</sup> 《钦定学政全书》卷10《学政关防》,第35页。

### 三、盛京教育经费

盛京教育经费,来源不一。兴办新学以后,教育经费主体来自清政府投入,下文专述。而在科举举行之时,国家投入所谓教育经费,主要投入到了宗学、觉罗学、书院等。然在百姓中占比最大的私塾教育,却没有任何资源投入,而恰恰正是私塾教育为最广大的社会阶层提供了一点受教育机会。由于几乎没有任何能系统分析的数字,所以,以下只能简述相关房产和待遇两个方面作为办学投入概况,仅为描摹。虽然也可以通过详细折算比价,以求大概,但数据搜集、计算工作量极大,有待于今后。

盛京宗室学、觉罗学共用房由官方建设提供,共42间。盛京宗室觉罗学教师、生员,由官方按京待遇,统一配给。宗室学,由官府全额资助。所谓“诸生给予公费银米纸笔冰炭等物之例,俱仿京学”,大体就是总管给七品官食俸,副管给八品官食俸。读书子弟,月给银三两,米三斗,川连纸一刀,笔三支、墨一笏。自十一月初到正月末,给炭一百八十斤。从五月初到七月底,每天给冰一块。满汉教习,每月给银二两,米二斛,每年棉衣、纱衣一次,三年内给皮衣两次。骑射教习,每月给银一两。五年内考核情况良好,总管、副管可升职。满汉教习,优秀者三年可升官。学习成绩优异者,还可以再加优赏。觉罗学参照宗学办理,副管、教习、学生,每月给银、米、纸、笔、墨,冬给炭,夏给冰,岁给衣服。八旗官学,用房由官方提供。教师仿京师八旗,给仓米12石,由盛京户部支给。

地方儒学方面,奉天府儒学为最优者,占地面积较大,设施相对较好,有大成殿,有东西厢房。辽阳州儒学,有圣殿三楹,后增至十楹,耳房、斋房,门班房等齐备。其他各儒学均有类似的圣殿、东西厢房,魁星楼、明伦堂、櫺星门,泮池等等,大多数由士绅捐献。建筑规模并不大,设施不足,图书亦不足。义学社学条件就更差一些,有讲堂三楹或者五楹,亦足可观。书院条件较好,沈阳书院有讲堂五楹,东西厢房各五楹,群房十一楹。萃升书院有讲堂五楹,斋舍二十一楹。襄平书院、海州书院、他山书院、银冈书院各有房舍,但是数量不多。

儒学基本经费由官方拨付,均可在专项工程上申请官方拨款,也可号召士绅捐助。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奉天儒学修启圣祠,系由工部拨款请修。到康熙四十九年,增修则由府尹廖腾燧率部属和当地绅士捐资修建<sup>[4]</sup>。再如大成殿,雍正九年(1731年)府尹黎致远率部属和当地士绅捐资重修大门和影壁等;锦州府儒学,由生员刘倬捐修照壁一座;盖平县儒学,康熙五十九年,由知县万如济和训导李如瑞“倡士民捐修”,其他如辽阳府儒学,各县儒学均有当地长官或者士绅捐资。

义学经费基本是由官方拨付学田,自收自支。顺治九年(1652年),各省开始设置社学义学。奉天府义学有学田“一顷四十一亩九分三厘五毫”,“例不纳粮”。辽阳州义学有学田“七十亩零三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官方拨给学田九百二十九亩八分,总额一千亩,年征银六十两。盖平县义学,原有学田五十二亩,乾隆三十一年官方拨给九百四十八亩,总额一千亩,年征银七十两。开原县义学,乾隆三十一年同样拨地一千亩,年征银五十两。锦州府义学,原有学田七百六十亩,乾隆三十一年补足到一千亩,年征银七十两。后锦州府知府李大绶捐田七百四十五亩二分,作为修葺费用。宁远州社学,原有学田四百零十亩,乾隆三十一年补足到一千亩,年征银七十两。广宁县义学,乾隆三十一年拨给学田一千亩,征银六十两。铁岭育英一塾,由私人捐建。

书院经费相对较多。沈阳书院掌教每年束脩银二百两,薪水银三十六两,生员每月给膏火银一两五钱,年支出奖赏银额外十三两。萃升书院,生员每人年给膏奖三十一两。另外自有学田三百二十余亩,承德县给学田银七百五十两,筹饷局拨银六百一十五两,户司拨款九百两,分别在五处钱商存银二千五百两。有东钱一万六千七百三十吊。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书院得到由东边税款支付的五百两,作为奖金。襄平书院,有学田七十亩,乾隆三十一年,补足到一千亩,年征银六十两。海州书院,原有学田一百五十亩,乾

隆三十一年,补足到一千亩,征银六十两。他山书院,原有学田一千亩,征银六十两。后学田增至三千八百余亩。银冈书院,乾隆三十一年拨给学田一千亩,年征银五十两。光绪十五年,乡绅杨生春、陈熙载各捐一万缗,作为本金生息为书院基金,岁入大概为二千八百元。凌川书院,原有学田七百六十亩,乾隆三十一年补足到一千亩,征银七十两。启凤书院,生员奖励及山长斋长薪金,年支出约一千三百两,乡试宾兴银,再支出二百两。柳城书院,光绪十一年,仅有地租收入约一千缗,后募捐到一千六百两银,折算东钱一万缗,发商生息。南金书院,乾隆三十一年拨给一千亩学田,征银七十两。启运书院、开文书院、辽西书院、龙冈书院、辰州书院、秀水书院、辅翼书院、莲沼书院等各有开支。

另外,教育方面,公宴宾兴等礼仪,有公务银两支出,有定例。文武举人旗扁银五十五两,会试公宴银一十五两;公车银二百四十两,文武生员宾兴银一百一十四两,这些均由官府支出。

#### 四、盛京科举

清太祖努尔哈赤虽设八旗学校,教养子弟,但他十分厌恶汉族读书人,杀掉了一大批,更无开科举之想法。到其子太宗皇太极时期,才始建文庙并开科取士。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表示“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文教佐太平”,所以“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靠校,各主家毋得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偿之。”<sup>①</sup>考试后,分别优劣,在300人中录取了200人,分别赏赐缎、布,并免二丁差徭。到天聪八年,又举行了一次考试,“考取汉人生员,分别等第,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分别赏赐银两。但这两次考试,只是考取生员,还不能算是开科取士。

天聪八年,皇太极正式下令举行了举人考试,这是八旗科举的第一次,分别考试满文、蒙文、汉文。录取了包括满族人刚林、敦多惠、查布海、恩格德等在内的16人。特别是通过礼部选拔举人,可以说是清代科举的最早雏形。崇德三年(1638年)再次科举考试,最终录取了举人10名,给予待遇,均授予相应职务。崇德六年,范文程等请再次考取生员举人,取中举人8名,生员45名。<sup>②</sup>这之后战事大兴,朝廷精力专注于用兵,盛京科举再未举行。

顺治元年(1644年),定鼎中原建都北京,全国范围内重开科举又提到上了日程。不过盛京地位特殊,普通民人参加正常科举,八旗子弟可参加满洲科举。但满洲、蒙古八旗科举时开时停,一方面要培养人才,另外一方面又怕八旗子弟专心习文后,以致武备松懈。所以,满洲科举录取人数也不固定。总的来说,盛京将军辖区内汉人士子和八旗士子,若参加科举考试,均参加顺天乡试。不过与关内文士相比,盛京文化相对落后,考取者并不多。以《盛京通志》(康熙)所载,进士仅有沈一揆一人,举人也仅有26人而已<sup>[5]</sup>。而从顺治三年到科举取消,数百年间盛京地区也仅有王尔烈考中乾隆三十六年的二甲第一名<sup>[6]</sup>。

从举人名额来看,盛京因人口稀少,文风不盛,相应名额也少了许多。顺治二年,奉天辽学生员,每科中额举人2名。顺治五年,辽学增额1名,奉天增至3名<sup>[7]</sup>。康熙八年(1669年),恩科加试,奉天府夹字号又增1名。康熙三十七年,奉天府夹字号加中举人1名<sup>[8]</sup>。康熙四十一年,奉天又增1名。康熙四十四年,奉天取5名,但不为成例。以后仍旧为4名。乾隆元年(1736年),奉天加增1名,共取5名。乾隆九年,又降回4名。<sup>③</sup>嘉庆三年(1798年)恩科,奉天加1名。道光元年(1821年)恩科,奉天加1名。光绪四年(1878年),奉天府夹字号取中4名,又加4名。大致来说,奉天夹字号取4名,偶有增加,但总数不多。据统计,顺

① 《清实录·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八月乙亥。

② 《清实录·太宗实录》卷40,崇德三年正月己卯。

③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48《礼部贡举·乡试中额一》。

治三年到光绪二十九年,夹字号乡试 111 科,录取举人 1135 名,另外科分未考举人 86 名,总数是 1221 名〔9〕。顺治二年定,直省每中式 1 人,取应试儒生 30 名。但是到康熙时期,江南、浙江可 60 名应试,后加至 100 名。①盛京难以与江南相比,如以 1135 名举人为基数,以 30—50 名应试儒生计算,则顺治到光绪,盛京累计大概约有 3 到 5 万人参加过科举乡试考试。

而这 1221 名举人中,最终考取进士者,只有 200 人上下而已。据统计,从顺治到光绪,盛京将军辖区约考取 183 名进士〔10〕。另据《奉天通志》记载,八旗进士亦有 200 余人〔11〕。考虑上述数字均有各种误差,盛京进士无论如何不会超过 400 人。据有学者统计数据表明,盛京数字最低,已经垫底。而进士人数最多的江苏省是奉天的 16 倍〔12〕,可见盛京科举进士人数之少。

## 五、盛京武举

从明代开始,武举逐步正规化,有详细的录取办法,考试后亦授予官职,也是民间百姓考取功名的另外一条渠道。清承明制,武举则更加严密。朝廷重视,考试程序严谨,无论是考试级别、考试过程还有考场安排等等均与普通科举相同,也同样分为乡试、会试、殿试,然后获得进士出身。武童生应试者,要到本县的礼房报名,填写履历,同考的五童要互保,还要找到本县的保人,确保符合资格。特别是匿丧报考,为特别严禁之事,历朝反复重申戒令。同时,武童应试,严禁冒籍考试。参加武童试的范围相比普通童试要更宽一些,盛京驻防旗人等更有宽限。凡八旗、汉军、蒙古愿意参加武试的,均由本旗开据姓名,移送顺天府考试。嘉庆十八年,满洲、蒙古可参与武试,包括各省驻防也可以参加武试,一直执行到科举取消。盛京驻防的武童生,可与奉天府一同考试。

武童考官由知县担任,府试由知府担任,一般省份院试由学政主考,盛京则由奉天府丞办理。武童生考试,最重要的是骑射,所以均需会同武职共同参与。康熙九年规定,各省取副将、参将、游击等较高级别官员中谙练骑射一员,奉天府所属则由奉天(盛京)将军选满洲协领一员,会同奉天府丞考取,三年一考,共取二十名。康熙十四年(1675年),又取消了地方武职的参与。到雍正元年(1723年),再次规定需要地方武职参与。奉天府考试,由奉天将军选满洲参领一员,同奉天府丞考试。雍正六年,再次规定,满洲、汉军用副都统级别,奉天用满洲协领。其他各省用副将、参将、游击级别官员。并最终形成定制:“奉天府考试时,盛京将军选派协领一员,会同奉天府丞考试。各照乡试之例,将武童内弓马娴熟、技艺优长者,分别双好、单好字号,令入场内,由学政秉公比较进取,其不能列好字号者不准入内场”。②

武童考试分别考过县、府,即算取得了武童生资格,可以参加院试,院试最重要,三年举行一次。童试考试有内场一、外场二,共计三次考试。顺治十八年(1661年)定,武童考试先策论,后骑射。到雍正十二年,改先骑射,然后考策论。外场考试时,安排教习查验武童姓名并由教习担保。第一场考马箭,骑马射三箭,全不中者即取消资格;第二场步箭,连续五箭,全不中或者只中一箭者取消资格。马步箭合格后,考试硬弓、舞刀、掇石三项。都合格之后,进入内场考试。但是内场考试,经常出现作弊情况,到雍正九年,要求必须提供亲供单,亲书籍贯、三代、年貌。取进时,再令对比笔迹。

武童名额,各省分别有名额。据《中国科举史·清代卷》记载,同治十年(1871年)的学额是清代八旗及各府州县定额最高数。按其统计,奉天省满字号无定额,每五六名内取进一名。咸丰五年(1855年)至同治六年(1867年)捐输,共加定额十名。奉天省合字号无定额,每五六名内取进一名。咸丰五年、九年捐输,共加定额八名,总计奉天省武生额累计 127 名〔13〕。各省取进武生后,造册送兵部,然后武生可入武学。无武

① 《学政全书》卷 36《录送科举》,第 128 页。

② 《钦定武场条例》卷 10《武生童考试一》。

学处,可由文学教官管辖。盛京及各驻防武生,照文生例,由本地教官管理,不过奉天武生学额最少,有武生学额的学校数量亦为全国最少<sup>[14]</sup>。

武乡试、武会试程序略同。早期,八旗不参加武科考试。到康熙四十七年,汉军可应试。雍正元年(1723年),准八旗满洲按汉军例,考武秀才、武举人。雍正十二年,又取消满洲考试,但是允许汉军应试。嘉庆十年(1805年),恢复满洲参加。武乡试三年一次,为正科,逢有庆典,则举行恩科。奉天考生,需在顺天参加考试。顺天武乡试,乾隆时期规定兵部选满汉司官各一人,皇帝从内大臣、大学士、都统等选派四人,再选派满汉御史四人。内场考试,翰林院、詹事府选派二人,同考官选派四人,外帘官选派四人。武乡试、武会试内外共三场,仍然是马箭、步射、技勇,试策二问,论一篇。乡试中额,历年不一。康熙二十六年,奉、锦二府,取中三名。乾隆时期,到光绪时,奉天均为三名。会试中额,基本为临期决定,嘉庆四年(1799年),增设了奉天中额。武殿试考试,则无盛京特殊规定,均照常考试。据《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统计,武进士三甲,没有盛京籍人。另据《奉天通志》统计,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盛京一共考中武进士82人,武举人则考中369人。

## 六、盛京新学

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就在盛京建立了东北第一所大学——奉天大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停办科举,中央成立学部,奉天省设立省立大学堂,为全省学务汇总之处。盛京也由此开始建立新式学校。同年,学政衙门撤销,设立学务处,为主管全省教育行政机关,设有教务、书记、庶务、编辑、调查、会计、收掌、游学八科。光绪三十二年,设提学使司,专管教育事务,府州县设劝学所。奉天省任命张鹤龄为首任提学使,张氏兢兢业业,投入极大心力,42岁病逝。光绪三十四年,奉天省建立了视学员制度,不再选拔原有教职。文庙奉祀,由视学员管理。立学堂后,奉天教职官改为文庙奉祀官。学务系统又有新的改变,各科又分股,办理专门事务。同时成立了教育研究会,专门研究私塾改良、宪政讲习、筹备图书馆、教育官练习所等等新兴事物。到此时,奉天省专门学校、实业学校、优级师范、初级师范、师范传习所、中学堂、高等小学堂、两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蒙养院、半日学堂、女子学堂、学务公所、劝学所、教育会、宣讲所、教育官练习所、小学总查所、图书馆等等均有设立,蔚为大观。据统计,光绪三十四年,盛京有教育机构2210个,学生85244人。到宣统元年(1909年),学生有106867人,位列全国第三<sup>[15]</sup>。有学者认为,奉天新式学堂推动了东北近代教育的兴起,为东北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sup>[16]</sup>。

新学兴起后,经费筹措甚为困难。光绪三十三年,奉天省有学生48000人,年支出学款白银140万两,光绪三十四年,学生数倍增,但是支出学款仅增加到170万两,入不敷出。据《奉天通志》记载,学款支出,首先是官款,学务公所的官员薪资,各校的房租都由此支出,大概全年用银91000两。除此之外的,教育官练习所,小学总查所、图书馆、师范中学、实业、方言、蒙文、艺术、两等小学、模范小学、女子小学、蒙养院等等,全年需用银290000两。还有殖边学堂、东三省旅京学堂、求实中学,另外资助各类大学等约20000两白银。留学日本、欧美资助经费数额不等。另外满汉蒙旗各小学全年需19000两白银。各州府县立学堂,每年由地方筹款,约28万两。来源各自不同。社会资助方面,主要是亩捐。其次是乡会。另外,私人办学方面,有能力独立建设的较少,更多是捐资于公立学校,从10000两白银到数千两白银不等。

## 七、盛京女子教育

女子教育只是从开新学以后才变成正规教育,在新学之前,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盛京女子或接受一点私塾教育,或女德教育,再者就是全无教育。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传教士在奉天成立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即基督教立育英女子小学校。光绪二十三年,辽阳基督教会建立了辽阳文德中学女校。光绪二十

八年,圣书公会建立了奉天瞽目重明女学校。光绪三十年,赵尔巽任盛京将军,主张“兴学固急,然不从女学、蒙学办起,则学无本”,经过推广,奉天省城有女学生300余人。

光绪三十一年,奉天省选派熊希龄到日本考察教育,与日本实践女校约定,每年派遣15名女学生到实践女校学习。光绪三十三年,选派女师范学堂学生37人,到日本实践女校学习。除官费外,女子自费留学也开始有所增加。如实践女校回国女生耿桂英,在开原女学堂、新民女学堂任教员。再如崔可言,曾任官立女子两等模范学校教员。

光绪三十一年,由振武学生陈嘉乐之母,在省城大东关创办淑慎女学堂,招生40名,章程完备,由学务处备案,每年补贴银二百五十两。又有奉天省城官立第一女子初高等小学校建立,有校长1人,教师21人,学生571人,分为14级,常经费1万余元;奉天省城官立第二女子初等高等小学校,有校长1人,教员17人,学生500人,分11级,常经费一万余元。光绪三十二年,奉天学务处创办了官立女子师范学堂,在省城大东门附近,设有2班,学生76名,堂长、教师均为女性,还有来自日本和英国的两位外国女教习。光绪三十四年,铁岭设立女子师范学堂,到宣统三年(1911年),50名毕业生中有40名开始从事教育。

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对女子教育加以鼓励和推动。光绪三十三年,奉天有女子学堂12处,职员17人,教员60人,学生694人。而此时全国共有女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8人。奉天女学生约占全国的4%。<sup>①</sup>光绪三十四年,时任辽源州陆军统领的张作霖捐建了新民府女学堂,有房屋34间,当时值银三千余两;同年海城生员金启第以自家房屋为校舍,乡公所购买校具图书,创办女学,有20多名女生就读。

光绪三十三年,奉天女子美术学堂由女子学堂的日本女性教员创办,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的女生,有专门的《奉天女子美术学堂章程》,分为撰科、高等科、简易科,学习刺绣、缝纫、唱歌等等。宣统元年(1909年),奉天旗务处在省城创办了八旗女工传习所。工师、教师、监课均由女性担任,主要以传习手工业为主,有绒科、刺绣、缝纫、编物等,附设讲堂讲习国文、算数、图画课程,招生以八旗妇女为限,招生额为100名。

地方官员也在推动女子教育,如绥中县县令,特意聘请日本女教习为家庭教习,以备兴办女学堂。盖平县学董沈羹唐,劝立城区女学不成,则自家出资,创办一女校,并家中十岁左右的女孩均入学,选一老儒为师。宣统二年,锦州建立公立育英女学堂,招收女生二十名,聘请女教员一名。本溪的柴德林,自筹八百元,欲创设女学堂,安东绅商学界共同拟议创办女学堂<sup>[17]</sup>。

到清末,奉天共有将近30所女子学堂,其中佼佼者有省城女子师范学堂、省城女子两等小学堂、省城女子初等小学堂,其他铁岭、辽阳、海城、辽中、锦县、绥中、宁远州等等均开办了女子学堂。而男女同校,则基本已进入民国时期。

## 八、盛京教育培养的人才

清代教育,从根本是为朝廷培养官员而设计的选拔路径。这与现代教育体系下培养全社会所需人才的教育体制完全不同。特别是盛京,地位特殊,虽以武功定天下取得了全国政权,但是仍然无法改变本地地区的落后面貌。从顺治以后直到民国建立,盛京地区所培养的人才数量上既少,以高水平知识分子的数量而言亦有质量不高之叹。大体来说,清代盛京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主要有科举所取之士,乡塾培养出来的识文断字者,新学建立后的学校毕业生,这三者对社会贡献最大。而投入了最多资源的盛京宗室觉罗学,几乎没有见到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名字者。

<sup>①</sup> 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页。数据出自学部总务司编:《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三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湾文海出版1998年版。但各学者统计略有出入,李斌统计为全国为女子学堂428所,15496名女生,见李斌著:《顿挫与嬗变:晚清社会变革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据学者统计,盛京地区在清代历朝科举中中式者,进士有顺治年间的夏敷九、穆尔漠等 161 人,康熙年间有李棠、高璜等 73 人,雍正年间有尹继善、永世等 23 人,乾隆年间有陆仪、蒋廷芳等 39 人,嘉庆年间有朱逵、董义等 25 人,道光年间有姚熊飞、刘光斗等 40 人,咸丰年间有郭鉴襄、邓庆麟等 17 人,同治年间有乔有年、王嘉安等 36 人,光绪年间有春溥、袁镇南等 85 人。特别是在早中期,进士取中者旗人占了 75.5%。<sup>[18]</sup>武进士,顺治年间有张武扬、于国柱,康熙年间有张自彪、穆廷杖等,雍正年间有铁景祐等,乾隆年间有周丹、夏文耀等,嘉庆年间有王润、张梦熊等,道光年间有杨大鹏、咸丰年间有王德懋、同治年间有张景华,光绪年间有刘殿甲等,共 63 人。据张杰教授统计,东北地区共有 9 个进士家族,共考中 19 人,盛京地区有 7 个,吉林地区有 2 个,黑龙江地区为空白<sup>[19]</sup>。可见,在东北较为落后的环境中,盛京相对较为突出。

再如,汉军镶红旗人陈景元、沈阳人戴亨、满洲镶白旗人长海,号为辽东三老,是本地培养出来的知名人士。辽阳人刘文麟,曾主讲沈阳书院。辽阳人王尔烈,考中乾隆辛卯科的二甲第一名,以词翰书法闻名,是辽东中举名次最高者。再如锦县朱自新,号称锦县儒学第一人,曾于嘉庆二年(1797 年)登进士第,任顺天府教授,后返乡教读于家。

萃升书院作为盛京排名第一的书院,有一批乡邦人士曾任山长。如前述王尔烈。再有张震,沈阳人,道光进士;繆德禧,沈阳人,嘉庆进士;刘文麟,辽阳人,道光进士;刘梦瑚,金州人,道光优贡;周僖,海城人,咸丰举人;曾培祺,辽阳人,同治进士;陆鸿尊,广宁人,咸丰进士;尹果,沈阳人,同治进士;李维臣,锦县人,光绪进士。如在锦州城内的凌川书院,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开办,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培养出拔贡 17 人,优贡 17 人,恩贡 25 人,岁贡 112 人,副贡 9 人,考中举人 48 人,进士 33 人,号称“桃李满城”<sup>[20]</sup>。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高宗弘历到盛京谒陵,表示“盛京为本朝根本重地,读书之士,渐糜文化,蒸蒸日上,勘与畿甸比隆,蛮貉所临,青衿献诗,趋逐弦颂,彬彬具见”<sup>[21]</sup>。

到光绪三十四年,转为新学之后,盛京有学堂及教育处所共计 2210 所,有学生 85244 人,受教育的基数极为扩大。各类专门学校,培养了从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所必需的专门人才,为民国以后盛京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扎实的人力基础。清代盛京涌现的出色人才并不多,早期以考中进士为主要目标,有若干较为出色。后期学校教育,才培养出了更多服务于本地需要的各专门行业人才,而不再是仅仅为国家选拔后备官僚队伍。

总的看来,盛京教育与关内其他地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身的特点。奉天府所辖汉人教育,基本采取全国一致的模式。而宗学、觉罗学、八旗学则与京师宗学、觉罗学、八旗学近似。从水平上看,盛京科举不盛,考中者亦少,落后直省甚多。但是新学兴起之后,奉天曾有过一个突飞猛进时期,但是很快又再次衰落,其轨迹有值得深思之处。盛京教育在东北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虽然相对于全国来说仍嫌落后,但是盛京教育仍然为盛京区域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人力资源储备。

#### 参考文献

- [1]王树楠等纂.奉天通志[M].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刘谨之等纂.乾隆盛京通志[M].康熙二十三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辽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 [2]张晓明.论清代奉天私塾教育[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5).
- [3]盛京通志[M]卷 19.康熙二十三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辽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3.
- [4]盛京通志[M]卷 21.学校志.康熙二十三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辽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A.
- [5]盛京通志[M]卷 16.康熙二十三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辽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 [6]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7.588.
- [7][8]钦定科场条例[M]卷 20.乡会试定额[A].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1521、1529.

- [9]楚江.清代举人额数的统计[D].长沙:湖南大学,2012.
- [10]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 [11]王树楠等纂.奉天通志[M]卷154.选举一.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
- [12]吴根洲.清代进士历史地理分布研究[J].考试研究,2011(3).
- [13]张希清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537.
- [14]李林.清代武生学额、人数及其地域分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3).
- [15]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M]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310.
- [16]李皓.从启蒙到发展:清季奉天教育的近代转型(1901-1911)[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 [17]吴凤岭.近代东北地区女子学校教育研究(清末—九一八事变)[D].辽宁大学,2012.
- [18]李喜平主编.辽宁教育史[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183.
- [19]张杰.清代东北边疆地区的科举进士家族[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3).
- [20]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一集[C].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43.
- [21]王树楠等纂.奉天通志[M]卷150.教育二.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

## The Compendium of Shengjing Education in Qing Dynasty

ZHOU Haobo<sup>1</sup>    GAO Yang<sup>2</sup>

(1.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2.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mode of Shengjing Education, Qing Dynasty is the education of the Han nationalitie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Fengtianfu, adopting a consistent nationally mode. As for Zongxue, Jueluoxue and Baqixue (all these are the school of imperial)are familiar to Zongxue, Jueluoxue and Baqixue in the capital of Qing Dynasty. The Shengjing Imperial Education was declined, few of the First-Degree Scholars could be selected. The number of the First-Degree Scholars in Shengjing is less than Zhili region. After the rise of Western Studies. Shengj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had a period of repid progress. but soon it fall into decay again,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ath worth our serious pondering. Shengjing Education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Northeast,providing a basic human resource reser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gjing area.

**Key Words:** Qing Dynasty; Shengjing; Education system

【责任编辑 至 仁】